

清朝通史

蔡美彪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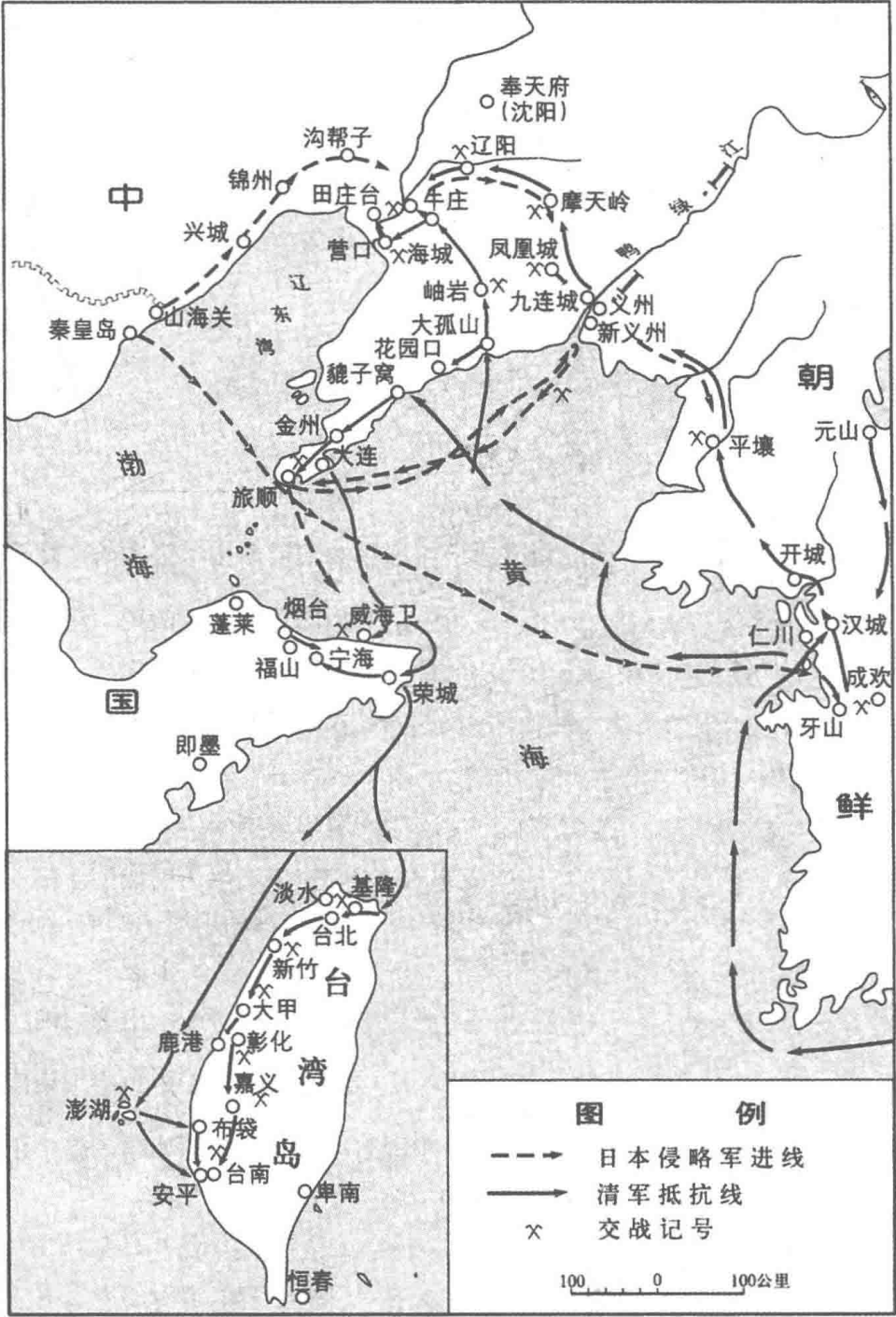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清朝通史

蔡美彪 汪敬虞 杨天石 罗筠筠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日战争图 1894—1895 年

目 录

第五章 外国在华企业与民办新型企业的开设	1
第一节 外国在华企业的设立	1
一、外国在华银行的开设与扩展	2
二、外国经营的远洋航运和内河航运	7
三、船舶修造业与丝茶加工业	11
第二节 中国民办新型企业的产生	18
一、船舶修造业	19
二、缫丝、棉纺等业	21
三、航运业	25
四、矿业	27
第六章 中日战争与清廷变法	29
第一节 日本侵略朝鲜与中日战争	29
一、中日出兵朝鲜	29
二、中日开战,日军入侵	34
三、清廷败降,割让台澎	43
四、列强的侵略	49
第二节 清廷的变法与政变	51

一、革新舆论的兴起	51
二、光绪帝宣诏变法	60
三、慈禧后发动政变	67
第七章 列强入侵与清廷再变法	76
第一节 慈禧后临朝与八国联军入侵	76
一、慈禧后临朝训政	76
二、义和团反洋教斗争	78
三、八国联军入侵	85
四、清廷屈辱议和	96
第二节 列强对边境的侵略	98
一、俄国侵占东三省	98
二、日俄之战	101
三、英国入侵西藏	103
第三节 清廷的再变法与赋税的征敛	105
一、清廷的变法自救	105
二、“新政”的实施	109
三、财政的困窘与赋税的征敛	116
第八章 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形成	125
第一节 列强各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125
一、银行业	126
二、航运	129
三、煤矿	132
四、铁路	134
五、其他工业	136
第二节 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138
一、银行	138
二、航运	140
三、矿业	142
四、铁路	144

五、纺织	148
六、其他	150
第三节 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工人的斗争	155
一、阶级成员的构成	155
二、商会的组建	159
三、产业工人的斗争	161
第九章 民主革命与清朝覆亡	163
第一节 民主革命的兴起与同盟会的成立	163
一、孙文发动革命	163
二、武装起义与革命舆论的传播	166
三、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172
第二节 清廷“预备立宪”与溥仪继统	184
一、清廷的“预备立宪”	184
二、溥仪继统,载沣摄政	188
三、群众请愿与内阁改制	191
第三节 武昌起义与议和	195
一、同盟会与革命运动的发展	195
二、武昌起义,各省独立	209
三、内阁改组与议和	219
第四节 民国创立,清朝覆亡	225
一、中华民国的建立	225
二、清朝覆亡,孙文引退	228
第十章 晚清时期学术文化概况	237
第一节 理学经学与西学	237
一、理学的流布	237
二、经学的演变	239
三、西学与新学	248
第二节 学术著作	253
一、历史学著作	253

二、历史地理学	264
三、考古发现	265
四、金石学著述	269
五、语言文字学	271
第三节 文学艺术	274
一、诗文	274
二、小说	282
三、戏剧与说唱	289
四、绘画与书法	297
第四节 科学技术	300
一、基础科学	301
二、农学与医学	306
三、印刷出版	309
人名索引	318

第五章 外国在华企业与民办 新型企业的开设

第一节 外国在华企业的设立

清王朝自鸦片战争战败以来,一再被迫开放对外通商口岸。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凭借在侵略性条约中攫取的经济特权,逐步开展对中国的商品贸易。贸易口岸的重心由广州北移到上海。输出的商品仍以丝茶为主,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鸦片和棉纺织品。但由于棉织品大量滞销,还并不能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

光绪帝即位以来的二十年间,由于苏伊士运河的通航缩短了东西方贸易的航程,欧亚之间海底电线的铺设,加速提供了中国市场的信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呈现出明显的新变动。主要是:(一)进出口商品的变动。属于工业制品的棉纱的进口,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的五万余担,价值关银(海关标准银)二百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增长到一百十六万担,值两千一百四十万两。农产品棉花的进口则由二十三万担下降到四万余担。进口商品中新增加了大量各种工业制品,即所谓“进口杂货”。郑观应在他所著《盛世危言》中列举光绪时进口杂货有:洋药、洋烟丝、纸卷烟、洋酒、洋糖、洋果干、洋水果、咖啡、洋布、洋绸、洋呢、洋毯、洋手巾、洋花边、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肥皂)、洋火(火柴)、洋油(煤油)以及电气灯、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等等,涉及食品、衣装和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郑观应估计,光绪中

叶,每年进口鸦片耗银三千五百万两、棉纱与棉布五千三百万两,杂货三千五百万两。进口杂货迅速增长,与原来的鸦片和棉制品三分天下,并在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需求。出口商品中历来作为主要商品的茶叶,由于受到印度、锡兰等地出口茶叶的竞争而明显下降,农产品大豆、芝麻、草席以及毛皮、猪鬃等成为外国商人收购外销的新项目,出口迅速增长。光绪中叶,约占出口总值的十分之一,并在继续扩大。(二)随着进口洋货的增长,行销地区日益扩展。华北以天津为基地,行销保定及山西各地。华南以广州为基地,行销到广西、贵州、云南诸省。华中以上海、汉口为基地,沿江远销到四川。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重庆进口洋货,约值银十五万两,六年后猛增到四百多万两。(三)洋货进口总值随之激增。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净进口总值关银四千万两。此后有升有降。光绪十三年超过一万万两,光绪二十年增长到一亿六千二百万两。经二十五年,超过了两倍。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详见下章)以前,资本主义诸国在华投资开设企业,是从开办银行和兴办航运业开始,随后又扩展到出口丝茶加工行业。这些企业的开设,主要还是为了适应扩大贸易、开拓市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输出过剩的资本。下面扼要叙述这时外国在华银行、航运业、丝茶加工业的概况。

一、外国在华银行的开设与扩展

(一)外国在华银行的开设

早在嘉庆年间,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已有帕西人(波斯移民后裔)来广州,试办银行。鸦片战争后,英国本土的银行开始在中国设立据点,同光之际呈现出新的发展,初步建立起各通商口岸的金融网络。

道光时英国有六家银行在华建立分支机构,大致情况如下。

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原名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成立于一八四二年,先设于印度孟买,一八四五年迁伦敦,改名。同年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设立分支机构,后二年在香港发行钞票,这是流通于中国市场上的第一批外国纸币。一八五〇年前在上海设立分行,实收资本六十万镑,不到五年,便增加到一百二十万镑。

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一八五一年成立。总行先在孟买,后移伦敦。成立后即在广州设分行,四年后,又在上海设代理处。一八六二年复在香港、汉口、福州开展业务,是最先进入中国内地的一家外国银行。一八六六年停闭。

呵加刺银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 Ltd.)——一八三三年在印度成立。一八五八年移至伦敦。此前四年,即已在上海设立分行,次年又在广州设立代理处,一八五八年香港也有了分行,一八六四年和伦敦一家大商业公司合并,增强了在英国殖民地银行中的地位。

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 China)——成立于一八五七年。中亚细亚特许银行(Chartered Bank of Asia)和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 China)合并而成。两行合并前,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已于一八五四年在上海、广州设立了代理机构。两行合并后,在香港设立分行,三年以后,又把上海的代理处改为分行。

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一八五八年开始营业,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在香港设立代理机构,汉口设立代理处。最初实缴资本三十二万二千镑,不到八年就增加到八十万镑。

一八六五年,英国开设了总行设立在中国的汇丰银行(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 Ltd.),汇丰的发起书上写道:“目前在中国的银行,只是总行在英国或印度



上海麦加利银行

的分支机构……很难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汇丰的目的“在于满足一项绝对的需要”,“带有极为广泛的性质”,“需要用更特殊的方式”实现,即企图独家控制中国的金融。

汇丰银行的资本,额定为银元五百万元。一八六四年招股。设在香港的总行和上海分行同时营业,当年在香港发行纸币。一八六六年在香港注册,正式成立公司组织,同年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分设代理处。一八六七年,上海分行也开始发钞。一八六八年,汉口、福州的代理处改设分行。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八年间,年年获利,上海一家英国的报纸写道:“在东方的全体企业中,无论在发展的速度方面,在成就的可靠方面,在影响的广泛方面,在基础的稳固方面,在前景的美妙方面,很少有几家能赶得上汇丰银行”。还有的报纸说:“它的成功,在银行史上是空前的。”



上海汇丰银行

一八七三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各国商品向国外跌价倾销。中国的进口贸易额随之急速增长。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又使外商获得了在内地运销洋货的特权。随着中外贸易的增长,外国在华银行的金融网也因而大为扩展。

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原已分布在上海、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通商口岸。此后,又先后在厦门(一八七六年)、烟台(一八七六年)、九江(一八七九年)、广州(一八八〇年)、北海(一八八〇年)、天津(一八八一年)、澳门(一八八一年)、北京(一八八五年)、打狗(今台湾高雄,一八八六年)、牛庄(一八九二年)、基隆(一八九四年)等处,设立了分支行或代理机构。建立起北起京津、南临海口,从沿海的上海、广州到内地的汉口、九江的金融网。

英国以外,法国的法兰西银行(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自一八六〇年起在上海、香港、福州、汉口陆续设立分行。一八八九年,德商在上海开办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又在各商埠开设分行。一八九四年以前的二十年间,外国银行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先后设立了四十五个分支机构。

(二) 金融活动的扩展

外国在华银行设立初期,主要是适应中外贸易的需要,活动范围有限,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和控制,也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随着在华金融网的扩大,金融活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展。

汇兑——外国在华银行经营的汇兑业务原来主要是在贸易方面。光绪朝二十年间,陆续扩展了两个新的领域,一是国外华侨汇款,一是国内商埠间的汇兑。

光绪初年,汇丰银行就已利用设在南洋华侨地区的分支机构,开始包揽华南地区的侨汇业务。侨汇可以弥补中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华南地区侨汇又可弥补华南对华中以及华中对上海的贸易逆差,从而为洋货销行各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八八六年,地处华南的厦门,年终一个月之内由汇丰经汇的侨款,即多达一百二三十万元。汇丰的汇票也在当地绅商中行用。

国内商埠间的贸易周转原来主要由各地票号承担。同治时,外国银行开始办理通商口岸之间的汇兑。光绪初年逐渐扩展于内地的各埠,但各地清偿货款仍以运现(现金)为主要形式。光绪中叶,以外国银行的汇票汇款逐渐普遍,运现显著减少。一八九一年汉口海关报告说:“中国商人对外国银行特别是汇丰银行的信任日增”,是汉口金融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

存放——存款与放款是外国银行经营的主要业务。据《汇丰营业报告》记录,一八七〇年以前,年存款一直在五百万元至六百万元之间。短期放款不过五百万元,长期的证券投资只有几十万元。约十年后,存款达到二千二百万元。放款和证券投资分别达到一千五百万元和三百五十万元。一八九五年,存款竟达到一亿四千三百万元,短期放款达到五千四百万元,证券投资也突破一千万。在汇丰银行的各项业务中,存放是扩张得最快的项目。

外国银行存放业务,扩展的新领域。一是清朝官方的借款,一是清朝官僚的存款。

清政府的外债,成为外国银行的一个新的目标。最初是一八七四年汇丰银行对台湾海防大臣沈葆楨的二百两“台防借款”。此后几年中,汇丰银行包办了近千万两的清政府借款。德法两国银行也在本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下,积极参与。到一八九五年为止,清政府举借外债四千六百万两,其中通过外国银行进行的,约占百分之七十四。而由汇丰银行一手包办的,达到二千九百万

两,占全部债款的百分之六十三以上。

清朝官僚作为外国银行的存户,大致是和外国银行作为清政府的债主同时开始的。频繁出现的外债,使得官僚们与外国银行增加了接触,而银行的借款与官僚的存款,也往往相互为用、一脉相通。官僚们把贪污中饱或经商所得厚利存入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在商人存户之外,又增加了一批新存户。

发钞——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在中国通商口岸原来很少流通,中国商人商业交易中仍保持通用银两的传统习惯,不接受外钞。随着贸易网的扩大,外钞逐渐成为在中国通商口岸市场上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汇丰银行的纸币进入汉口和天津。厦门发行以西班牙本洋为单位的“银元钞票”,达六七十万。出口茶叶和华侨汇款全以汇丰的银元钞票支付。汇丰的纸币在福州普遍流行,代替了有长久历史的福州钱票。一八八〇年以后,中国的通商口岸几乎无一处没有汇丰纸币。有些交易契约,甚至特别规定须用汇丰的钞票支付。其他外国银行的纸币,也为钱庄和商人所接受。

综上所述,自同光之际,外国在华银行的各项业务,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后,又有更大的扩张,为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

(三)对金融市场的控制

外国在华银行得以逐渐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是由于拥有以下的条件。(一)外国银行取代原来的洋行放款给中国商人,接受钱庄庄票和短期拆放流动资金。一八七八年上海一家报纸说:“中国钱庄大半都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外国银行通过拆放,贷给钱庄的款项,年逾银数百万两。一八八八年,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总结二十五年来与中国人的交易,多达几亿两,从而控制了中国的钱庄和商人。(二)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地位下降,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渐为外国商人所操纵。依靠外国资金周转的中国商人,为免受洋商勒价,往往被迫贮留货物,支付贷款的利息,从而长久地受到外国银行放贷的控制。(三)东西方交通方式和贸易方式的改变,外国银行得以更为灵活地拨汇和运用资金。电报通讯的建立,又使得伦敦的金融家得以及时掌握上海市场的动向,加强控制。

约在光绪帝即位后,世界市场上的白银价格持续下降。同光之际,中国白

银每两汇价为英镑五先令。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竟下跌到二先令十一便士。由于银价不断下跌,外国商人向中国出口货物实行所谓“预定制度”(Indent System),即在订货时即结算货款而不再是在交货时结算,借以把汇价的风险转移给中国商人。外国在华银行由此得以掌握进出口贸易的周转,并通过操纵银行外汇牌价,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一切看外国银行牌价”,逐渐形成常规。

二、外国经营的远洋航运和内河航运

航运是通商的必要条件。清王朝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前,内河航运基本上以帆船载运,远洋航运则完全依靠外国轮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诸国相继开设远洋轮船公司,包揽了中国与诸国之间的远洋航运,进而依恃历次条约所获取的特权,侵入中国内河和沿海,经营航运。

(一) 远洋航运

早在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已有英国商船驶进上海。一八四五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的货轮开到香港,开辟了每月往来一次的中英航线,成为第一家对华定期航运的外国航运企业。此后约二十年间,这家公司独揽了中国远洋运输的利益。同治、光绪两朝,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相继设立对华远洋航运的企业,互相争夺海上商运之利。

英国——英国大英轮船公司对中国远洋航运的垄断,在一八六八年遇到了竞争者。以利物浦为基地的英国海洋轮船公司,进入中国的航运,成为新出现的又一巨头。一八七七年,大英轮船公司废弃旧轮,建造新轮,更新设备,再度夺得经营的优势。一八八二年,又有一家以英国格拉斯哥为基地的招商协力中英轮船有限公司成立,专营对中国的远洋运输。一八八四年以后,在上海、汉口、厦门、广州、澳门等地相继设立了代理机构。并在上海刊登广告,招纳本地华人股份。通过所谓“招商协力”实现了外国资本与中国商人势力的结合。

法国——法国在一八六二年成立法兰西火轮公司,开辟东方航线,争夺中国对欧洲的航运。一度形成与英国大英轮船公司、海洋轮运公司鼎足而三,相

互竞争激烈。一八七八年,三家达成联合齐价协议,商定统一制定运费,分配货运数量,以解决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但协议并不能真正付诸实行。英法竞争日剧,英国始终处于优势。

美国——美国在一八六七年成立太平洋邮轮公司,开辟了由旧金山经日本横滨到上海的定期航运。一八八〇年,美国的远洋轮运公司又开辟了由纽约经巴拿马运河到上海的新航线。美国的棉纺织品经新航线运往上海,运费大为减少。

日本——日本在一八七六年成立三菱邮轮公司,争夺日本至上海之间的航运。两年后即兼并了美国的太平洋邮轮公司,从而完全控制了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运输。

德国——德国的北德轮船公司在一八八五年开始经营中德之间的航运,成为垄断中国与欧洲间航运的英、法等轮船公司的竞争对手。

加拿大——加拿大的昌兴火轮公司,一八九一年在中国和加拿大西海岸之间开辟了一条新航线。

各国远洋轮船公司经营中国间的远洋运输,多得到本国政府的资助。英国大英轮船公司、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法国法兰西火轮公司、日本三菱公司、德国北德轮船公司等,成立之初,都曾接受本国政府的补贴,从而成为各国政府向远东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各国远洋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往往又是金融巨头,与向外扩张的银行势力结合到一起。

(二)内河及沿海航运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内河及沿海商埠间的运输,主要依靠帆船。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大小帆船二十多万只,可载运货物四五百万吨,形成庞大的航运网。清廷开放长江通商口岸后,西方诸国侵入中国内河,以载重巨大行驶快速的轮船与中国传统的帆船争夺航运之利。

早在一八五〇年,英国的一家省港邮船公司即开始侵入中国沿海,在香港、广州之间航行。一八六一年,上海的美商琼记洋行的商船自上海航行到汉口。另一家美商清美洋行的轮船航行在上海、芝罘至天津的沿海航线。此后,上海的外国洋行纷纷购置轮船经营中国内河和沿海的货运。美国的旗昌和英国的怡和、太古形成三大巨头,展开争夺航运的竞争。

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成立于一八六二年,主持者为旗昌洋行的股东曾任驻上海副领事金能亨(E.Cunningham)。招纳英、美等洋行投资又招中国商人附股,集资至一百万两,号称“万国轮船公司”,航行长江。与此同时,英国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也购置轮船,经营长江航运。三家以降低运价争夺货源,竞争日益激烈。一八六四年末,成立齐价协定。一八六七年,三家又达成划分经营地区的十年协议。十年之内,怡和、宝顺不再经营长江航运,旗昌不经营上海以南的沿海口岸。随后,旗昌又将宝顺的全部轮船收购,取得竞争的胜利。

旗昌轮船公司霸占长江航运后,又着手经营上海至天津的沿海航运。英国怡和洋行在经营上海福州航线之外,也于一八六九年经营津沪一线,与旗昌角逐。至一八七五年统计,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转运贸易,英国占据一半左右,形成压倒的优势。

一八七三年,得到英国海洋轮运公司支持的太古洋行,招纳中国商人投资,创办华海轮船公司,拥有资本二十六万英镑,轮船六只。进入长江,与旗昌竞争,运费较旗昌降低一半以上。旗昌被迫于一八七四年与太古订立联营协议,规定从上海至汉口,两家开出同等数目的轮船,所得运费均分。旗昌垄断长江航运四年,至此而被打破。一八七七年,旗昌轮船公司又因经营困难,将全部资产以高价卖给中国的轮船招商局,结束了它在中国的航运经营。

旗昌公司倒闭后,英国的怡和洋行又恢复了长江的航运。一八七九年成立扬子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汉口间的航运。两年后,又与华海轮船公司合并建立颇具规模的怡和轮船公司,经营长江与沿海的航运。拥有资本四十五万英镑,轮船十三艘。

英国的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于是成为经营长江与沿海航运的两大巨头。此后十年内,迅速发展,获得厚利,拥有的船只与吨位成倍地增长。在此期间,英、俄、德、日、美等国也各有轮船或木船经营长江航运,江面上外国航船往来如穿梭,但都只有较小的规模,在货运经营上远不能与英国的太古、怡和比高低。

扼制招商局——清朝轮船招商局所经营的航运,从兴办时起,即遭到外国轮船公司以降价的手段进行的打击。一八七六年,两江总督沈葆楨曾奏言:“太古、旗昌两洋行又合力以倾我招商局,各项水脚减半,甚且减三分之二,该行意在陷人”。(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六册)招商局以高价收购旗昌

资产后,又不能不遭到怡和、太古两公司的扼制。一八七八年,招商局与两公司订立齐价合同,以求统一运费标准。但次年即被两公司所废弃,不再遵守。一八八三年又订立第二次合同,商订三家“同心协力”以驱逐其他公司的航运。轮船招商局于一八八五年由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但所经营的商运,仍遭到英国巨商的压制,难以维持。一八九一年,又与英国两公司订立第三次合同。太古公司甚至要求“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指中国商船)以便“独占其利”。

窥伺川江——英商垄断上海至汉口长江中下游的航运后,进而窥伺上游川江,以求扩占四川腹地的贸易市场。一八七六年烟台条约订立后,宜昌开辟为通商口岸。此后数年间英国轮船在汉口、宜昌间往来航运,并开始侦察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线。

一八八三年,曾经参加洋枪队镇压太平军的上海租界工部局雇员英人立德(A.J.Little),乘帆船沿江侦察宜昌至重庆的航道。次年在宜昌设立立德洋行,向清廷申请航行重庆。一八八七年又成立川江轮船公司,订购轮船,准备起航。立德的活动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次年,英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发给立德行轮执照。

川江航线历来由中国帆船往来货运,数万船工、纤手赖以为生。外轮闯入,势必影响生计,因而群起反对。清廷惧生事端,由总理衙门向英公使交涉,英轮不入川江。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达成协议:以重庆通商为条件,英轮于十年内暂不入川;清朝官方以两万三千四百英镑的高价收购川江轮船公司不过万镑的资产。立德敲诈得手。李鸿章声言“明知立德赚银不少”,“姑求十年无事”(《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八二)。但事隔八年,立德便又在上海建造轮船利川号,强行开到重庆。

(三) 航运保险

外国在华经营航运的轮船公司大都兼营航运保险。一八六二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成立后即附设扬子保险公司,资本银二十万两,企图垄断长江航运的保险业务。次年,英国商人以上海的不营航运的五家洋行为后盾,成立了名为保家行的专业保险公司,与扬子对抗,获得巨额利润。资本由银二十五万两扩大到六十万两。